

有态度 (第二期)

朱婧:栖身学院的写作 仍渴望声音的对话和交流

本期栏目主持人:杜佳 李英俊

编者的话

在当下众多写作者中,经受过完整学术训练的高校教师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职业上得天独厚的优势某种意义上解放了身心,让他们有更多时间从事写作,阅读、授业、鉴评等职业属性也为他们行走在创作的现场创造了条件。教师、学者、作家的复合身份令这一写作群体的实践总体上呈现出人文性、前瞻性和探索性。在自媒体时代,相较日益繁荣的大众文化呈现出的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倾向,他们的非职业化写作具备更加独立的品格与追求,或许是一种可供借鉴的、接近于理想的写作状态。《有态度》专栏第二期以“距离‘理想的写作’有多远?——学院视野中的写作品格与价值追求”为话题,探讨学院视野中的文学书写,邀请数位活跃在高校的中青年作家、批评家参与讨论,通过观察梳理受过完整学术训练、具有学院背景的作家群的习学养成与创作实践,辐射当下写作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以期以鲜明的观点链接现实,形成启发。本期刊发该专栏对作家朱婧的访谈。



朱婧,文学博士,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出版有小说集《譬若檐滴》等。获江苏省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



大学文学教育生态与写作密不可分

中国作家协会:在当下作家群体中,有一类是经过完整学术训练、较长时期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研究的,还进行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专职教师和兼职作家的统一体,身兼教师、作家、学者等多重身份。在您看来,这一群体所拥有的多重身份对他们的写作构成怎样的影响?

朱婧:作家在大学写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即新文学作家几乎都是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的职业往往是在大学和出版机构,从北大到西南联大都是这样。现在之所以强调在大学写作作家的学院身份,部分原因在于1949年以后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制度出现之后形成了“专业作家写作”的新传统。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大学写作的传统慢慢恢复,比如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我工作的南京师范大学,也有鲁羊和郭平等小说家。一直到新世纪以来,随着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建设和发展,作家在大学教书、做研究并写作就很常见了。大学给作家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写作环境,而在大学写作,作家自然地以其大学教育参与到文学生产中间。他们的多重身份首先影响的是大学文学教育生态,然后才是他们的写作。但我不认为,在大学写作就会形成一个统一风格化的学院写作。不过像张柠、王尧等这样从事专业文学研究同时也写作的作家,可能会有文体意义的影响,但也要个案分析。

中国作家协会:从创作立场的角度考量,学院派作家从事的是具有学院背景、经过学术训练与规范的非职业化写作。请结合自身经历和创作经验谈谈学院派作家创作的状态是怎样的?

朱婧:大学是一个相对自由、适合写作的地方。和职业作家不同,在大学写作的作家大多与学生接触,可以第一时间收获不同读者的阅读反应。而且,在学院写作的作家,特别是教文学课程的作家,日常往往需要研习各个时代不同地方写作的作品,对个人的写作可能会构成一个参照的维度。同样,在遴选作家作品的过程中,也可能返身观照作家的写作。

就我自己而言,短篇小说创作处理的题材内容有一个方面集中于女性和家庭,是一个“易受制”的题材。在写作课程中,我和学生研读A.S.拜厄特的作品,我注意到,她在处理相似题材时所采用的方法很有启发性。拜厄特的作品《马蒂斯的故事》借马蒂斯三幅作品讲与艺术相关的三个故事,同时也是关于女性在具体处境中的困惑、压抑、伤害和想象力的描述。生活化的叙事使女性的情感体验得以具象化,艺术作品的丰富意蕴扩张了主题内容的空间,使之延展到关于艺术、生命和人性等诸多命题的思考。

“独立性不是关门主义的独立性”

中国作家协会:一位高校作家曾经谈到,“我是以对艺术负责的态度进行小说写作的,基本没有考虑过畅销的问题。忠于现实,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是我的原则,我不会因市场的考虑而改变自己的写作态度”。不少学院派作家更是终其一生践行了写作的独立品格。在您看来,专业评价和市场反馈对学院派作家写作的影响几何?这些评价机制如在学院外一样奏效吗?

朱婧:在市场化与大众传媒时代,一个作家脱离其写作几无可能,而且作家写作只是整个文学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作品最终都要经由发表、出版和市场等环节才能到达读者。关键是如何和市场、传媒相处,如何在市场化和传媒化的时代恪守作家的独立性,所谓独立性不是关门主义的独立性。至于专业评价和市场反馈,你在不在它都发生和存在。在一个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就算栖身学院,屏蔽一切外面的声音也几无可能。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各种声音的对话和交流,当然不排除存在着冲突。真正的独立性应存在于这个各种声音喧嚣的场域。至于学院外,也是各种声音之间的对话和协商。

李院在谈到90年代文学现场时就说过,“大众消费时代已经来临,文化正在成为一种消费形式,严肃文学的写作面对这些就不能不重视消费文化的挑战,不能不重视由‘大众’构成的新的文学环境,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和读者的关系。”(《漫谈“纯文学”》)同时,其实他也指出纯文学应从更丰富的小说修辞学的传统中寻求营养,包括西方18、19世纪古典小说技巧向通俗文学的下沉,包括中国的笔记体章回体小说传统,而不仅限于20世纪现代派创作的这一套系统。

以写促教,寻找审美意义的共情

中国作家协会:您提到写作影响到教学和研究,能否就此谈谈详情?

朱婧:我在大学教写作和文学批评,创作使得我在选择

研究对象时可能更多基于内心的共情和同理心,以及审美意义的理解和同情。这几年,我写林文月、张怡微等的评论就是如此。至于我的博士论文选择重审“上海摩登”,可能和我对王安忆的阅读有关系,王安忆也是在大学教书和写作,而且王安忆对其他作家的理解方式也启发到我。自然而然,我选择王安忆作为我对“上海摩登”观察的样本。不仅如此,写作也影响到我学术研究的文本和修辞,不是那种严格意义的文学史论文,而是文学评论,因为文学评论让我有可能和我的研究对象自由地进行将心比心的对话。

中国作家协会:您认为什么是理想的写作?您觉得学院派的写作可以为理想的写作提供怎样的营养?

朱婧:就像您反复肯定的学院作家的独立品格。学院作家可以获得相对的独立品格和大学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关系,大学和大学教师先天被赋予了对于时代观察和反思的位置和能力。这和“理想的写作”在精神气质上密切相关。一定意义上,理想的写作应该是作家对他们所处时代观察和反思的结果。

瞄准自身角色,完成内在的切换

中国作家协会:学院派作家总体上具有深厚的学识修养,这是否为这一群体的文学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这是否对这一群体的写作价值取向构成制约?

朱婧:写作前提的构成是很复杂的。存在着各种类型的作家,学识修养可能对某种类型的写作特别重要,但单单依靠学识不一定能成为作家。事实上,对于作家而言,如果写作中需要某种知识,是可以及时学习获得的。许多作家的写作实践中都有田野调查和史料检索。再有,今天大学里的作家构成相当复杂。选择依靠学识或者知识写作只是一种可能,比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王尧的《民谣》依靠个人经验可能比他的学识修养更多,而李洱的《应物兄》则需要相当多的知识做准备。再比如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和《白雪乌鸦》等,还有阿来写《瞻对》也做了充分的知识调查。更年轻一代的作家的这种意识可能更为强烈,比如葛亮曾在访谈中坦言花费7年写作的《北鸢》,一开始想写成一部非虚构作品,花3年时间做资料整理、案头工作,积累了差不多100多万字。

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更多诉诸感性形象,而学术研究和学术批评则更多诉诸理性,在您看来,这是否会成为学院派作

家不得不面对的内在冲突?

朱婧:很多时候,在大学写作的作家内心可能有一个切换装置,做学术研究和批评的时候切换相应的频道,而写作的时候则是另外的频道,就我个人而言,反而可能是写作影响到我的教学和研究。内在冲突可能就在切换的那一刻,需要找到自己的角色。

博尔赫斯说:“我经历得很少,但是我懂得很多。”在一个理性和知识被推崇的时代,单凭感性很难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学术训练带来的理性对文学创作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包括逻辑思维的建构对小说的谋篇布局的效用,包括具体的工作方法如田野调查等在小说材料占有时的使用。

但同时,在理性逻辑当道的时代,感性在研究或者批评中又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南帆在《空洞的理念:纯文学之辩》中说,“无数的理论语言正在覆盖描述和解释这个世界,赋予秩序,这时,文学保持了一种感性的自由,这种感性的洞察产生的活力即是文学不断地自我颠覆的原动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感性的洞察可能解除某些理性的遮蔽而解放人们的视域。”

在延长线上,继续理想的写作

中国作家协会:您因在《萌芽》发表作品年少成名,后因一些个人生活变化而淡出人们的视野,2019年年底,短篇小说集《譬若檐滴》出版使您重回读者的视野。中断10年后重拾写作的难点在何处?

朱婧:中断10年并不意味和文学现场完全脱离。因为写作教学的需要,我对当时一起出道的朋友和同时代作家在写什么一直都有关注,但10年过去,中国文学的审美趣味和风尚的变化很大,大学生态格局也在变化,更年轻的作家不断进场,这中间我的日常生活和心智、文学趣味等也发生着变化。重拾写作就是以个人的10年之变回到变化的文学现场,自然会面对着个人写作的自我调整,但我认为这种调整和过去的写作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是所谓的“旧我生新我”,是一条写作的延长线。专业的学术训练,尤其是文学史训练,让我得以在更广阔的文学世界、更大的文学人群中审视作为个体的我的写作,意识到一个写作者的可能和限度。

中国作家协会:2020年1月,您在《花城》发表了小说《先生,先生》。这篇围绕“读中文系的人”展开的故事构思数月、修改数次。为什么写这个故事是困难的?您曾经透露自己未来的写作计划将专注两个“序列”,其中之一便是包括小说《先生,先生》在内的“高校书写序列”,能否谈谈将“高校”作为书写对象的原因?

朱婧:写作《先生,先生》时,是在写作理想的大学,面对理想之物的许多不能言尽只是写作困难的核心。比起后来在《水中的奥菲利亚》和《葛西》中的发问和质问,赞美和呵护的语言是更难以表达的。

将“高校”作为书写对象,是在自己相对熟悉的场域的一种观察和书写的必然。高校也并非象牙塔和乌托邦,它和外部世界的种种也是共通的,关注这个场域,更是关注在这个场域中群体的精神生态。

中国作家协会:高校是否能培养出作家,其实已经被反复讨论过。在这方面,您个人的实践经验是怎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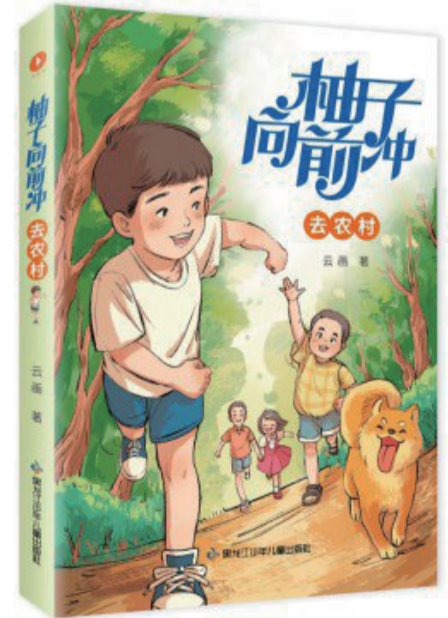
朱婧:评论家李敬泽认为:“中国写作者从来不乏高远志向和自以为天赋神授的天才,缺少的是严格的专业训练。”一些大作家“在技术层面上甚至是不合格的”。2011年,上海大学成立中国文学创意写作研究中心。2012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设立创意写作本科专业。2013年,南京大学创办了创意写作专业。2014年,北大中文系招收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复旦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有十多年历史,提出“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批学院派作家,视野开阔、思想深刻、逻辑清晰,有丰富的学养和知识结构,有想象力,同时有一定学科背景。”雨跃辉、张怡微、王侃瑜、余静如等作家即由此走出来。

综上所述可以结论:如果考虑培养规模和教人学习写作,高校培养作家应该是具有创意写作意义的。我们学校写作课程中以工作坊的形式推进,同时开设创意写作相关的硕士方向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刘雅

当一个全职妈妈开始决定写作

——《柚子向前冲 去农村》作者云画专访



庭时,多半是母亲承担这个角色。正如云画所说,任何职位都可以找到替代者,只有妈妈才是无可替代的。然而,全职妈妈的辛酸和无奈,或许只有她们自己才懂。云画表示,“全职妈妈”这个“职业”比她想象得要辛苦100倍:没有薪水,全年无休,重复性劳动居多,平凡琐碎,没有成就感,不被尊重,而这是社会上大部分家庭主妇的现状。

事情从2020年开始有转机。那时候孩子已经8岁,家庭生活步入有条不紊的轨道。云画回忆起自己小学六年级便开始在《小学生优秀作文》《少年文艺》等文学刊物发表文章,那时候的激动与喜悦如今依旧记忆犹新。来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又一直从事文字工作。“现在的我江郎才尽了”吗?每到孩子入睡的夜晚,她常在心中自问。“曾经文学梦,再度在云画心里萌芽、生长。在一次亲子活动中,云画遇到一位作家朋友,她鼓起勇气拿出一篇文章给她,让她看看自己是否具备创作小说的能力。没想到作家朋友看完后大为赞叹,“她说我的文字细腻、柔软又很清晰,非常能打动人”。家人看完她的文章后,也鼓励她尝试儿童文学创作。受到作家朋友和家人的双重肯定,云画重新拾起了手中的笔。

虽然曾经从事文字工作,也在陪伴孩子读绘本、童书的过程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可是从零开始创作的过程比云画想象的要艰难得多。《柚子向前冲 去农村》这本书,她写完第一遍后又推翻重来,前后反复修改7次,直至第9稿才定稿。“遇到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写第一稿时,完全像一个人在没有矿灯的情况下,在长长的黑暗隧道中摸索的

感觉。”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也是终生的学校,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伴随一生的。云画决定自己要写的第一部小说主题就是关于原生家庭对于成长的重要性,这也是她多年来育儿积累的思考和经验表达。“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现在的父母在对待孩子上更加‘用心’,这是好事,但难免‘用力过猛’,这种‘猛’又会带来孩子承受力变弱等一系列心理问题。”云画观察到,周围的很多父母依旧秉持“我都是为你好”这种传统思维,很少反思自身,缺乏“自省力”,云画最初创作念头正是想写一本孩子和家长都可以看的童书。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云画,对乡土风情非常熟悉并有深远的眷恋。于是她的第一本童书,就把主人公——7岁的男孩柚子带到了农村过暑假。柚子是个胆小内向的小男生,他有一个开明但脾气急躁的爸爸,一个有耐心但有轻微洁癖的妈妈。爸爸妈妈经常吵架,这让柚子非常苦恼,他因此变得更加胆小自闭了。柚子到农村后,结识了又黑又壮的“铁塔大伯”、盲童叶香香、冰雪女王“沐沐”,还有“一号侦察兵”豪豪和他的死党狗剩。他们跳土墙、“偷菜”养鸡场、在大铁盆中洗澡、去西瓜地啃西瓜、当“小邮递员”、勇闯“怪屋”……这一切让柚子体会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胆”和“自由”。与此同时,柚子一家久违的和谐与温暖也在这个夏日荡漾开来。

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谈及小说创作中的虚实关系,云画表示,《柚子向前冲 去农村》整个故事是虚构的,但个别人物是有原型的,部分素材也有生活来源,比如“坐动车”和“在科技馆差点走丢”情节是云画家真实发生过的。但主要来自一些生活感受而非“事件”。她表示,在这本童书里藏着很多“隐喻”,比如为了让小说充满诗意而虚构出“兔子洞”“蓝色铁皮房”“白杨树”“雨中的喇叭花”等。但主人公柚子在农村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因为生活本身是非常平淡温馨的,根本构不成充满情节的“故事”。在书快写完的时候,云画看到央视正在颁发“2020年度中国好书奖”,其中陶勇医生的随笔集《目光》获奖了,这位医生很善良,为盲人带去了光明,却遭受了意外重创,令人感慨。于是我决定在自己书中增加一位虚构的人物——盲童叶香香,以此致敬陶勇医生,让更多的人关爱盲童。当然,他并不认识我”。

虽然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颇有心得,但和所有的妈妈一样,云画也有无力、焦虑的时刻,这时,教育专家尹建莉老师的一种观念支撑着她,“教育的四个关键词是——阅读、尊重、自由和家长的表率作用。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这几个词,你的教育就做得又美又好。”云画发现,当她把这些用到孩子身上后,确实起到神奇的效果,“难关”自然就过去了。

作为全职妈妈的云画,写作只是在保证孩子的正常起居和家庭的良好运转后的“副产品”,然而这却是她作为个体的“人”,“生命中最能突破自己、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文学助她实现疲累生活中伟大的梦想,同时也疗愈着一个中年人的琐碎日常。如果把理想比喻成一束光,那么文学就是这束光,照进她的生活,让一切变得不一样。然而云画明白,仅仅拥有梦想是不够的,还需要付诸行动。要学会制定目标并分解目标,然后一点点地去实现它。

当问到“做妈妈”和“写书”冲突的时候,她将如何选择?云画平静地回答,“我会选择‘做妈妈’,写书的时间另外去补。毕竟‘人’比‘事’重要,当然,我会提前安排好写作时间,尽量少发生冲突。”

她想对所有用写作全部的爱给予孩子和家人的全职妈妈说,“就算全天下都不理解,你也要为自己骄傲,因为你放弃了一切来爱自己的孩子,这是很伟大的。虽然你生活的圈子很小,但是你思想的圈子不能小。要跳出这个身份,用一个‘人’的身份来衡量,在这个地球上,要以什么样的姿态存在。这个‘姿态’包含外表和心灵,然后找到自己闪光的地方,去把它做好。当你把‘自我’完善得很好,也就相当于言传身教,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成为了孩子的榜样。”

所以,“柚子向前冲”系列,云画还会继续写下去。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协会 www.chinawriter.com.cn 本专刊与中国作家协会合办